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 张惠言文选

钱仲联 / 主编  
严明等 / 选注评点

阳湖文派领袖

经术文赋俱工



苏州大学出版社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

钱仲联 / 主编

# 张惠言文选

严明 董俊珏 / 选注评点

苏州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惠言文选/(清)张惠言著;严明,董俊珏选注.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9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钱仲联主编)  
ISBN 7-81037-796-5

I. 张… II. ①张…②严…③董…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715 号

策划编辑 王英志

责任编辑 徐斯年

明 清 八 大 家 文 选 丛 书

## 张 惠 言 文 选

钱仲联/主编 严 明 董俊珏/选注评点

|      |                                   |
|------|-----------------------------------|
| 出版发行 | 苏州大学出版社<br>(苏州市干将东路200号 邮编215021)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通州印刷总厂<br>(通州市交通路55号 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字 数  | 204千字                             |
| 印 张  | 8.75 插页2                          |
| 版 次  | 2001年9月第1版<br>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册                           |
| 标准书号 | ISBN 7-81037-796-5/I·29           |
| 定 价  | 15.00元                            |

## 编辑缘起与体例

王 英 志

中国明清之前的散文自明代古文家茅坤编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家散文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之后，乃有“唐宋八大家”之称，影响十分深远。而有关唐宋八大家的文选从古至今已出版了不计其数。但遗憾的是唐宋以后明清的散文大家及其散文作品，却一直受到冷落，从总体上挑选、评价明清散文大家的工作，极少有人问津，建国后则更未见；而读者对明清散文从总体上把握、了解的需求却是客观存在的。为此，今仿效“唐宋八大家”之名，提出“明清八大家”，以与“唐宋八大家”相呼应；并编辑“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以与《唐宋八大家文钞》相配套。此丛书计划每一位明清散文大家出一册散文选本，组成一套“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八册。此套丛书大体上反映了明清主要散文大家的创作成就，可以开阅读者眼界，使之对中国古代散文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亦可填补图书市场空白。应该说这是一套很有意义的古代散文图书。

编选此丛书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明清八大家”人选。如今古代文言散文研究者固已相当缺少，而能写文言散文、能体味古体散文之三味的专家，更难得其人。所幸年逾九旬的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尚健在。钱仲联先生不但对明清散文有精深的研究，而且自己能写作古体散文，深得其中奥妙，实为克服这一困难的最佳人选。故特邀明清诗文研究泰斗、博士生导师钱仲联教授斟酌圈定明清八大人选，力求使明清八大人选具有权威性、科学性，至

少可成一家之说，能为多数读者所接受。现经钱仲联教授反复考虑，确定明代刘基、归有光、王世贞，清代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曾国藩为“明清散文八大家”。此八大家的散文创作代表了明清不同时期不同文派的最高水平，亦反映了明清两代散文创作的主要成就。

丛书聘请钱仲联教授任主编，本人作为丛书的策划人及钱仲联教授的弟子，协助钱仲联教授负责具体操作，聘请、组织校内外明清诗文专家（多为从事明清诗文教学、研究的教授或文学博士）承担撰稿任务。每一散文大家入选作品篇目先由撰稿人草拟，再由钱仲联主编修订确定，使入选篇目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作家的散文成就与风格、特色。然后由策划人拟订编写内容与体例要求，确定样稿，供编写者参考，以保证丛书体例、规范的统一，提高整体质量。丛书的内容、体例大致如下：

一、每册书前皆有本“编辑缘起与体例”及钱仲联教授所撰丛书“总序”。

二、附图：每册书前附作者图像（个别阙如）、书法手迹各一幅，另附作者主要文集扉页（个别为封面或版权页）、正文书影各一幅。

三、目录：每册文章按写作年代先后或内容类别编排，年代不详者按文集卷数先后编排。

四、前言：着重介绍作者生平、思想、散文成就与地位，使读者对该作家有整体、全面的了解。

五、正文：采用简体字，加标点符号，文章酌情分段。注释序号采用小方括号，右上标，标在句末标点符号之前。文末注明文章出处。

六、【题解】：简介本文写作时间、缘起、背景，文章的思想内容等，附带注释文章题目中的难点，在下面的【注释】中不再注释题目文字。

七、【注释】：注释内容包括人名、地名、时间、职官、器物等的

解释,典故、引文出处等的说明,以及生僻词语的拼音(另加常见同音字)、解释。本书读者一般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因此词语注释忌琐细。着重注释冷僻难懂的文言词,以及古今意义不同的词语。

八、【评点】:“评点”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侧重结合文章思想内容用简练的语言对文章进行写作艺术的分析。就一篇文章而言,着重评点一两个写作艺术特色,不求面面俱到;但就全书而言,则体现多角度、多侧面,全面充分地反映该大家文章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造诣。

九、附录:书末附录关于古文大家的传记资料、评论资料,以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古文大家的生平与事迹以及文坛地位与散文特点,并附录撰稿者所参考的原著、选本、论著等文献名称,注明版本,为读者深入探讨提供线索。

此套丛书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于问世,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2001年1月于苏州大学



总

序

钱 仲 联

古文，又称古文辞。古文辞之名，早见于韩愈文集，故“桐城派”姚鼐所编古文选，名为《古文辞类纂》。古文辞，是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骈偶文章而言的，而韵文中的辞赋，姚选也列为一类，以区别于唐宋时代和以后应试用的非古式的律赋。姚选本不选录律赋。

姚鼐选本，所包罗的家数极多，作家的时代，上及先秦，下迄清代桐城派的刘大櫟。属于唐宋的，则以所谓“唐宋八大家”为主体，入选的文章特别多。

“唐宋八大家”之称，最早出现的，为明后期的“唐宋派”古文家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八大家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而据《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继“唐宋八大家”之后，又有所谓“金元明八大家”之目，清人李祖陶编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五十三卷，其书仅有原木刻本，流行不广。现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另起炉灶，计划选录明清两代古文，也以八大家为代表，取它可以继踵“唐宋八大家”，而不见逊色者，以之嘉惠士林，使后继者能以少总多，从中取得借鉴，以达到创新之目的。

那么，入选哪八大家呢？

首先考虑到的，是八家散体古文，必须是卓越杰出的，代表明清两代各种主要文派的，必须是学问高深，儒林文苑，人们一向仰为山斗的；然后，来一个结集，让读者倾心当意，可以认同。

因此，我们在明代先选了刘基。刘基政治、道德、文章，在明初

首屈一指,较之同时之宋濂,实为过之;故取以冠明代。继之为归有光,为明代“唐宋派”古文家之旗帜,姚鼐早已选入《古文辞类纂》,大家当然是首肯的。明代在文坛长期主盟的是前、后七子,他们是远宗秦汉的,唐宋不在话下。然而后七子中的王世贞,实在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期他写古文,也包含唐宋家法。他的《弇州山人四部稿》《读书后》等,佳构纷呈。归有光曾讥他为“妄庸巨子”,他笑说:“妄则有之,庸则未也。”后来他为归有光作赞,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又可以见到二人异途同归的实质。明代取此三家够了。汤显祖在词曲领域称雄,不必以古文与三家争长;其他如公安、竟陵,则成就更小。

有清一代,首取顾炎武。顾氏不但学术为一代开山,古文亦雄厚无敌,清初三大儒,黄宗羲、王夫之,俱逊炎武:黄氏文杂;王氏以《读通鉴论》著名,旨在借题发挥,为反清服务,范围较隘,故不录取。清初旧有所谓“三大古文家”者,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侯氏虽工文,晚节不终;魏禧遗民,古文则难压倒时人;汪琬局面更小。故这里亦不选入。接着是姚鼐,代表“桐城派”,其文清窈高远,桐城派方苞、刘大櫆,都不及姚。王先谦、黎庶昌两家《续古文辞类纂》,都大量选入姚氏之文。接着是张惠言,代表“阳湖派”,惠言是学人,以“虞氏易”名家;又能为古赋,词为“常州派”宗祖,可谓一专多能。接着是龚自珍,是个不立宗派的大家,经史兼长,经则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兼长;文辞特多创新,言皆有物,影响晚清文坛,至为深远。接着为曾国藩,开创“湘乡派”,拓“桐城派”堂庑而大之,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则包办了晚清古文事业。

以上五家,作为清文代表,可谓文坛之五岳,合之明代三家,以上继“唐宋八大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了。

至于对“明清八大家”的评论、介绍,都详于各家选本的前言中,我就不再饶舌了。

2000年11月于苏州大学

文業自序。

余少學為文。窮日夜力。屏他務。為之十餘年。迨往。  
知其利病。其後好文。遂辭賦為一。又以為時文者。三四  
年。余石王悔生。見余黃山賦。而喜之。勸余為古文。謂余  
以所受於其師劉海峯者。為一二年。稍一得。因規渠。已  
而思古。以文傳者。惟於聖人有合者。要就其所  
得。莫不。是以立身行義。施天下。收一切。治為。如楊。如  
費。如董仲舒。以儒老莊。莊周。以清靜。皆要。而南。如。

大雲山人評本

茗柯文編

《茗柯文編》扉頁（光緒七年〈1881〉刻本）

茗柯文初編

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囿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譎詭  
列嶽蓋象崑崙閩風方丈蓬萊又其幽局宮別杳冥  
旭凝霜仍雪闕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  
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練其鼎玉女流其函鸞  
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亭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  
茲邦因往探焉故復竄覽誕略未遂冥尋然于高  
則窮蓮花之崇于奇則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  
山之絕觀方俟永解纓絡結廬神隩故聊託篇翰  
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

《茗柯文初編》正文（大云山評本，光緒七年（1881）刻）



## 前 言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其书斋名“茗柯堂”,世称茗柯先生。武进(今属江苏常州)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职。张惠言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经学论著有《周易虞氏义》《周易郑荀义》《虞氏消息》《仪礼图》等二十余种,文学著作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并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刘海峰文钞》等。

张惠言出身于世业儒的贫寒家庭。从他的七世祖张典以下,到他的祖父张金第、父亲张蟾宾,都以教授乡里为谋生方式。其《先府君行实》谓:“自典至金第皆补郡县学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为事。而铭伋(按指其五世祖)当明之亡,独不为制举业云。”其父张蟾宾,也是“补府学生,试高等廪膳,常教授乡里间”。张惠言同样是沿着祖辈寒士加文儒的人生轨迹走过来的。他四岁时父亲就因病辞世,靠母亲姜氏和姐姐观书做女工,将他与遗腹而生的弟弟张琦(按初名翊)抚养成人。据其《先妣事略》记载,他九岁离家,至常州城中依伯父张思楷读书,“逾月,时乃一归省。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飧,

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耶？吾与而姊而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张惠言早年的艰难困苦，于此可见一斑，而他短暂的一生，也一直是在“奔走衣食，汲汲靡底”（《答庄卿珊书》）的困顿中度过。迫于家贫，张惠言十四岁便以“童子师”的身份执教于乡里，过早地承担起了生活的重荷。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艰辛备至的环境，磨炼了张惠言坚强的毅力和韧劲，使他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始终保持着达观平和、蹈厉奋发的人格精神，尽管遭际坎坷，仕途连蹇，却从不作怨天尤人之语。更重要的是，严酷的现实促使他对社会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境况进行全面而深刻的体察、思考，从而对时弊有了清醒的认识。诚如其《送福子申宰漳平序》所谓：“天之霜雪一也，凡卉得之以杀，而松柏得之以坚，士之处贫贱，乌可一概而道哉！”张惠言正是这样一位“得力于劳苦饿乏拂乱”的狷洁之士与磊落奇才。

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和思想的渐趋成熟、深邃，张惠言从囿于一己的文人情结中解脱出来，不再满足于“簞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自我道德完善，而要求积极地致用天下，以体现由生活和时代所激发的社会责任感。尽管他对科举考试投以极大的热情，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对自身实学根基的培植上。在屡试京闱而不第的七八年间，张惠言先后完成了《周易虞氏义》《周易郑荀义》《仪礼图》等经学著述的修撰。这充分表现了他努力丰富自己的思想蕴藉，以求经世致用的认真而迫切的态度。在治学与为人方面，他谆谆告诫后学“治经术当不杂名利”，“勿求为天下名士”（《与陈扶雅书》），实际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鞭策。他非但不像某些文人那样恃才傲物，沽名钓誉，反而表现了十分的谦虚谨慎。恽敬所作《张皋文墓志铭》中记载，张惠言在非常欣赏他才华的恩师、大学士朱珪面前，“未尝私求见，以所能自异，默然随群弟子进退而已”。就他的名字看，“惠言”“皋文”的“言”“文”都含有一种声华外露之意，而他以“茗柯”一词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却是由外露转为内敛，旨在探求内在的充实之美。“茗柯”一词出自《世说新语·赏誉下》：“简文云：

‘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解释说：“谓如茗之枝柯虽小，中有实理，非外搏而中虚也。”张惠言正是以此自勉的，同时这也体现了他对自身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他的外甥董士锡在《同门祭张先生文》中说：“先生之教，不专于文，曰行曰德，惟本是惇。”这种以德行为本的意识使张惠言显露出醇正的儒家风范。恽敬《张皋文墓志铭》中述张惠言自陈曰：“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一，岂足为第一流哉！”是对此最有力的说明。

张惠言在有清一代学术史上颇负盛名。《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武进阳湖县志》等史籍中一致将其列入“儒林”或“经学”传。这表明在世人眼里，张惠言首先是一位恂恂儒者，一位杰出的经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散文家，一位才华横溢的词人。他的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周易》和“三礼”的研究上。阮元《〈茗柯文编〉序》指出，张惠言“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于《礼》郑氏……圣人之道在六经，而《易》究其原，《礼》穷其变，知扶阳抑阴之旨，然后交际之必辨其类，议论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经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后措施必求其实，有裨于治，许与必衷于彝典也”。这段话不但阐明了张惠言的学术特色，而且对他的人格精神和立身行事的要旨也有所揭橥。在《文稿自序》中，张惠言以“述其迹象、辟其户牖”来概括自己在《易》《礼》研究方面的成果，而他内心所期望的，则是“微显阐幽，开物成务，昭古今之统，合天人之纪”。单是这一份胸襟气魄，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对于张惠言的礼学研究，学术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代的包世臣在《述学》诗中说：“《易》义终不晦，敦复有张氏（惠言）。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师。”龚自珍《常州高材篇》也提到：“《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张惠言所受推重之盛、影响之广，于此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常州今文经学异军突起，赳赳然将与风靡乾嘉学界的考据学分庭抗礼之际。常州学派主张用西汉宗尚“微言

大义”的今文经学去取代东汉专讲“训诂名物”的古文经学，认为讲求微言大义，才能经世致用，救国家之急。这是常州学派不同于当时吴、皖两派的学术趋向，而张惠言一生的立身行事和著述文章，也深深为这种精神所灌注浸染。他与常州学派的开创者庄存与的子侄后辈庄述祖、庄有可、庄绶甲等交谊甚笃，过往密切，时常在一起商榷经义。这一方面对张惠言本人治学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他也以自己对《易》《礼》研究的精深造诣，为常州学派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疏通知远、“揆其本源”（《〈易义别录〉序》）的思维方式 and 博学多思的风格，对常州今文学派新学风的形成，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刘逢禄、宋翔凤都受过他的影响。刘逢禄的《易》《礼》之学，大都出自张惠言；宋翔凤既治《公羊》，“后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刘师培《近儒学术系统论》）。

张惠言的学术思想与他的文学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本人曾多次谈论“学道”和“作文”的内在关联，后人论及他的经术文章，对此也颇为留意。可以说，不理解作为学者的张惠言，也就无法懂得作为文学家的张惠言。下面着重探讨一下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

首先来看一看张惠言的词学建树。号称词学中兴的清代，活跃于康乾词坛的是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和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羨派。浙派标举姜（夔）、张（炎）之醇雅清空，但过于追求雅正的格调和形式技巧，其末流不免琐屑俚亵，浮薄空疏。阳羨派以苏（轼）、辛（弃疾）为宗尚，却因一意讲求激昂豪放而流于粗率叫嚣。而且，浙西、阳羨两派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常州词派则于此二派日趋衰敝之际乘时而起，并以其系统的词学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张惠言就是这一新的词学流派的开山鼻祖。

张惠言的词学主张主要见之于他与其弟张琦合编的《词选》二卷。此书编选目的在于“塞其下流，导其渊源”（《词选序》），使初学词

者知道词体之尊，不致被俗腔滥调引入歧途。为此，他采取以儒学见解论词的方法，强调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旨，认为词与《诗》《骚》同源异流，在艺术生命的本质上也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规定了词以立意为主，贵有内容，贵有寄托，小中见大，在表现“男女哀乐”时寓写君子的心志乃至更广泛的时代生活。这一主张对浙派词末流的弊病有所匡正，也切合清代中晚期国运日衰之下困于忧患的词人的创作心理。《茗柯词》是张惠言这种独树一帜的词论的具体实践。该词集中多为抒写江南乡思、别绪恋情和流连光景之作，反映生活面不广，某些作品也流于晦涩，衡其创作理论，未免名不副实。但他的词在当时毕竟格调较高，创作态度也相当严肃，并善于选择适当的表现形式，因而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语言清丽，韵律和谐，委婉而含蓄，形成一种沉郁凄怆、深美闺约的风格，为世所宗仰。譬如其中《木兰花慢·杨花》《水调歌头五首·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等名篇，意趣高浑，笔调旷远，脍炙人口。常州词派后起的代表人物谭献对张惠言评价极高，称其词作“胸襟学问，酝酿喷薄而出，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篋中词》）。文廷式也认为“张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离乎方罅者矣”（《云起轩词》自序）。朱祖谋则赞其词有“回澜力”，为“词源疏浚手，横流一别见淄渑”（《望江南》词）。这些评语切中肯綮，显示出张惠言在清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实属不刊之论。实际上，张惠言之所以能在词史上雄踞一席，其创作实绩倒在其次，关键还是由于他推尊词体的努力，使一向被视作“小道”的词具备了和诗体同等的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将原先作为单纯文学形式的词体纳入了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这无疑是词学史上的一个本质性突破。张惠言的词学观，正是他注重政治教化的文学功用观的具体反映，是其学术思想在词学方面的体现。

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指出，张惠言“著述以古文为最，词固余力及之”。的确，最能体现张惠言文学造诣、最能反映其人格精神和思想感情的，当属他的散文创作。

张惠言文选

006

恽敬把张惠言的文章大致划为两个阶段：“少为辞赋，尝拟司马相如、扬雄之言；及壮，为古文，效韩氏愈、欧阳氏修。”（《张皋文墓志铭》）张惠言自己在《文稿自序》等文章中，也对其求学历程作了总结，与恽敬所言基本一致。这样的阶段划分，对认识张惠言的文章风貌是很有帮助的。

张惠言早年即致力于辞赋创作，取径于汉魏六朝，实际上体现了由六朝而上溯汉魏的倾向。相对来说，他的大赋主要学汉魏，小赋则以六朝为宗，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变化。前者可以《游黄山赋》《黄山赋》为代表，后者则以《望江南花赋》《邓石如篆势》最具特色。《游黄山赋》《黄山赋》写得颇有气势，文采富赡，形容尽致，不但刻画出了黄山的气势和景物，而且在描摹的真切和具体上，较汉人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体现出张惠言博大的才情与深厚的功力，确非常人所能及，所以恽敬才惊叹道：“自相如、枚乘歿后，二千年无此作矣！”（吴德旋《张皋文先生述》）章太炎也认为“虽未至，庶几李、杜之伦”（《国故论衡·辨诗》）。章氏是以汉赋为标准来衡量张氏辞赋的，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除了善于从汉大赋的传统中取得借鉴之外，张惠言还相当留心汲取魏晋六朝体物小赋的成就，《望江南花赋》就是其咏物小赋中的佳作。该篇中“华不饰悦，香不越林，群不比标，偏不戾参”等寥寥数语，体现出张惠言不媚俗、不傲世的沉静渊雅的为人风格，虽然清新秀丽比之六朝小赋有所不及，然而托意之幽深，构思之精微，则又稍胜一筹。《邓石如篆势》又不同，它的体制虽似六朝小赋，气格却规模汉赋，以凌厉的气势取胜。张惠言赋的这些特点，与他个人的才艺修养和赋学观点是密切相关的。他编选的《七十家赋钞》，断止于庾信，且对魏晋以下的赋家多有微辞，说明他对唐以下的赋作是不屑一顾的。归根结底，这反映出了张惠言的经学思想对其艺术好尚的深刻影响。

张惠言转入古文创作，自谓“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文稿自序》）。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眼界的开扩，他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的社会责任。他认识到，“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